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十八）

2000年1月的中国媒体，在广州，上海，北京，用同样的文字和内容，统一报导了一个秘密：30年前，也就是1970年1月5日，云南发生过一场里氏

七点七级特大地震。地震的中心在通海，灾区有七个县，峨山，建水，华宁，玉溪，石屏，江川，都在其内。报导说，这场地震，死亡15621人，受伤26783人，塌房33万多间，经济损失按照现在的可比价格计算，通海一县即达人民币27亿元。报导又说，地震发生后，灾区老百姓虽然得到了几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几十万个毛主席像章，但救灾物资少得可怜。报导还说，由于灾区的干部群众和迅速赶来支援的解放军指战员自力更生，现在新通海已经成为云南经济十强县之一了。

这么大的天灾，居然向老百姓保密，隐瞒了30年，在这个地球上真可以称得上绝无仅有！为什么保密？怎么样保密？现在发表的那篇揭露当时秘密的通稿中是这样说的：“由于当时处于‘文革’特殊时期，仅由新华社对外发了一条简短消息，只字不提受灾情况，而且把震级压低了。”寥寥两行字，包藏着微妙的消息。我认为，这篇稿应该载入史册，因为它可以使人懂得好些道理。

在漫长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统治下，中国形成了一套避讳的传统和理论，对于贵为帝王的尊者，关系特殊的亲者，道貌岸然的贤者，这三种人犯了错误或者出了丑事，大家必须守口如瓶，假装不知道。在古代中国，为避讳而保密是天经地义，“正常现象”，不足为怪。但即使按照那种陈腐霉烂的标准，和上述三种人无关的人祸，比如翻船，塌桥以及各种豆腐渣工程，历来不在保密之列，天灾更不必说。

文革期间所以连地震都要保密，确实不可思议，只有“特殊时期”四个字能够解释。文革在残暴和虚弱两方面都到了特殊的程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能够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土地上，保密的范围是能够随着统治者的意志任意覆盖任何事物的。保密保密，统治者不想叫老百姓知道的一切事情统统都是“密”，即使在人命关天的紧急救援关头也不准放松。其中的规律是：保密的范围，既和统治者的残暴程度成正比，也和统治者的虚弱程度成正比。文革是风雨飘摇草木皆兵的特殊不稳定时期，领导者经常处在心惊肉跳的困境之中，无怪乎地震也成了保密的对象之一。此其一。

其二，解放以后，管制新闻操纵舆论比解放以前容易得多。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也搞新闻统制，很费劲。据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9月1日社论《反对国民党反动的新闻政策》总结，国民党对付异己的进步报纸需要使用八种手段：1，检查稿件；2，任意删削；3，威胁读者；4，阻碍推销；5，派遣特务打入报馆；6，逐渐攘夺管理权；7，强迫收买；8，勒令封闭。新中国因为都是国有的公营的党领导的自家报纸，没有异己的报纸，垄断新闻易如反掌。领导者一声令下，全国新闻舆论媒体立即执行。你要反右派，好，全国异口同声报导右派的罪恶。你要办人民公社，好，全国异口同声赞美人民公社的德政。除开主旋律，不准有别的声音。即使在不搞文革的非特殊时期也是如此，特殊时期自不待言，有何难哉！

其三，创造假消息的办法，无非隐瞒和造谣两手，从中国古代的赵高秦桧到外国当代的戈培尔，都是这两手，花样很难翻新。倒是如何发布假新闻，中国在文革那个特殊时期颇有自己的特色，其中之一叫做“内外有别”。拿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个实例来说，就采取了“对外发消息”对内不发消息的手法。为什么不能把地震告诉国内的老百姓？大概是稳定压倒一切，不能叫天灾人祸影响莺歌燕舞的主旋律，所以必须把国家的主人蒙在鼓里。至于对外发消息的道理，不仅因为国外有测试手段，瞒不住；更高明的是，只要对外一发消息，就能够造成中国从来“不”封锁消息的假象，使外国人以为中国人正在享受高度的新闻自由。不过消息必须简短，表示中国正在锐意改进文风，和又臭又长的党八股告别，所以有充分理由只字不提受灾情况。至于把震级压低到什么程度，有来自最高层的统一口径，只要大家异口同声，死死咬定不是七点七级，死死咬定没有死一个人，众口铄金，天衣无缝，万众一口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驳。如果有人胆敢说真话，那是“泄密”，“造谣惑众”。

”，是“刑事犯”，从严从重惩办，这叫依法治国，谁敢说三道四！

其四，笔杆子不是孤立的，必须和别的控制手段配合运用。这很重要，大家都看得出来，不必多说。

这篇报导有缺点。主要的缺点是没有把行为的主体说出来。保密保密，这么大的灾难到底是谁有权决定向老百姓保密？没有说。泄密泄密，当地和外地那些直言不讳的百姓和记者后来遭到了什么样的命运？也没有说。不过，成绩是主要的，这篇报导毕竟讲了一些新东西，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些老问题。

□ 此文为“美国之音”2000年1月16日播出

∞ ∞ ∞ ∞ ∞ ∞ ∞ ∞ ∞ ∞

陈伯达垮台前后（二之二）

• 汪东兴 •

9月9日我们下庐山后，毛主席的专列先到长沙，毛主席与华国锋同志在车上谈了话。专列停在支线休息，于15日到武昌。

在去武昌的路上，毛主席亲切地问我：“你在想什么？”

我说：“我在想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问题。”

毛主席高兴地说：“这好嘛！”

我说：“在山上开会，忙于会务，没有时间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有空闲时间了，可以好好地理理自己的思想了。”

毛主席对我的态度比较满意。他说：“这样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你的心是好心。”

9月15日，专列抵达武昌。送毛主席到东湖宾馆住下。安顿好后，我就考虑根据自己新的认识，再写一份检查。到了晚上，我的检查写好了，呈送给毛主席。

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已经点了陈伯达的名，对陈伯达的错误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所以，我对自己错误的性质的认识又提高了一些。在这次的检查中，我也批判了陈伯达。

现将我第二次书面检讨的主要内容抄录如下：

主席：

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除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两次检查和一次书面检讨外，最近经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启发很大，教育很深，我越想越难受，总觉得对不起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我真是辜负了主席的信任和教育。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这是有罪的，我应牢记这次教训，努力改正错误。

我完全拥护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英明指示。在这指示以前，我没有识破陈伯达。他的手段特别阴险、恶毒，利用九届二中全会搞突然袭击，造谣和诡辩，欺骗不少同志。他打着论天才的旗号，其实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要夺毛主席的权，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次把陈伯达揪出来，使党更加团结，更加纯洁，更加巩固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前三天被陈伯达利用欺骗有三件事：（一）在华北组他突

然的又是有计划的发言，利用我的无能，而心情非常激动，又不加分析，更不顾自己的身分，就起来发言，结果当了陈伯达坏人的炮手。（二）我怀疑陈伯达事先看过修改过华北组的简报，他利用简报来扩大到各组煽动欺骗人。我建议中央派人追查陈伯达，事先是否看过修改过这期简报，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而且简报内容中他的很少，我的很多。我看有阴谋，有鬼。（三）陈伯达利用听林副主席录音报告时，把论天才的语录交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现在看来是陈伯达的阴谋诡计，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存在着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思想，有主观片面性，遇事易激动，缺乏冷静的考虑分析问题，再加上文化理论水平低，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团结不够，平常学用毛泽东思想不好。因此，遇到陈伯达这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反而受他蒙蔽利用了。

这次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路线的错误，对我触动很大，教育很深，我应很好的接受这次教训。今后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特别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锻炼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切实改造世界观。上述认识是否妥当，请指示。

敬礼！

汪东兴 1970年9月15日

毛主席看过我的第二次书面检查后，表示满意，在我写给他的信上面用铅笔作了批示：“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在第一页信纸的左右空白处又写道：“陈（即陈伯达——作者注）案另是一个问题，应弄清楚。”

9月16日上午10点半，毛主席让吴旭君（毛主席的护士长——作者注）通知我去谈话。这次谈话一直谈到了11点50分。

毛主席说：“你写的信我看过了，信中对问题的认识很好，接受教训。我看有些同志还不通，上了当，还不通？现在不通，慢慢总要通嘛！有些同志自己不懂马列主义，自己都没有看过马列主义这一方面的书，发言时又要引用。我看还是要进行教育，还是要250多人（指中委、候补中委——作者注）中指定读点马列主义的书，30多本太多，可在30本书内选些章节出来。此事请总理、康老办。我还可以提选一些。不读马列主义怎么行呢？不行的。结果就被陈伯达摆弄了。”

在谈到军委办事组时，毛主席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指黄永胜等人——作者注）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

在谈到陈伯达的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的任务是对付帝、修、反。而陈伯达不管帝、修、反。我写了一份七百字的意见，给陈看时，他马上说他与苏修无关系。我又不是问他这事，他急着声明这个问题。”

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六号简报时，毛主席说：“六号简报要抓紧核实，你怀疑陈伯达看过、改过，应找会议主持同志，还有王良恩同志和记录印发的人。为什么不经你看过，发出最早最快？由总理、康生和你一起查实为好。要他们不要再上陈伯达的当了，有错误就改正。”

毛主席一面抽着烟，不时地呷口茶，一面和我慢慢地谈着。

他问我：“你说他们（指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作者注）在各组一起动作，煽动，他们几个，还有黄永胜报名要发言（会议前期，黄永胜留在北京，但他准备了书面发言稿——作者注），都用了语录，但他们的简报未发，一说不行了，记录就收回，这当中好像是有点名堂，你清不清楚？”

我摇了摇头，说：“我不清楚。”

毛主席接着说：“你跟我出来了，他们在北京是否在陈伯达处商量过？”

我又摇了摇头，说：“不清楚。”

毛主席若有所思地说：“谁知陈伯达住在何处有何活动？谁能知道？陈伯达案另办。与你们好人犯错误不同。”

毛主席说：“我在简报上看到，皮定均同志在发言中说，怀疑他们都在24日下午发言，是统一部署的。”

毛主席还要我找曾思玉单独谈一下，征求一下他有什么看法。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出要先回北京。

他说：“你先回去，让总理和康生召集会议，把你给我的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

毛主席还说：“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或找我来谈。”

出于对毛主席安全的考虑，我说：“我的意见，我们还是一起回北京。我的那封信可以叫通讯员先带回去。”

但是，毛主席还是坚持要我乘送文件来的飞机先回北京。他说：“早一天回去，让他们早一点觉悟也好嘛。”

这样，我只好准备第二天早上先飞回北京去了。

16日下午，我去找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聊了两个多小时，他还陪我吃了晚饭。谈起庐山会议，曾思玉同志说：“当时我是一盆浆糊，弄不清楚。”

我笑着问：“现在你还是一盆浆糊？”

他说：“开始我脑子是一盆浆糊，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通过学习，慢慢地了解了。”

我诚恳地说：“庐山会议上我也犯了错误。”

他说：“中南组也是紧张的，说有人要推翻毛主席，打倒毛主席，有人要夺毛主席的权。叶群发言就是这样讲的，她还说毛主席是天才没有错。”

我讲自己的看法：“毛主席的天才是从实际中学的，是靠看书学习，天才不完全是先天的，天才主要是后天的。我们过去认识不清，现在才有所认识。”

曾思玉说：“那几个副词，我也是同意的。毛主席在‘九大’报告中把它去掉了，我未听进去，总觉得这是毛主席的谦虚。”

我和曾思玉谈话中，相互交换了一些思想认识。

晚饭后，我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我就没有打扰他。午夜12点钟吃过夜餐后，我上床休息。到了凌晨4点钟左右，护士长吴旭君来敲我的门，我

正要起身开门，吴旭君说不用开了。她从门缝塞进来一张纸条，并且告诉我说：“你不要起来了，看一看条子就行了。”我捡起条子见上面写着：“主席讲，你不要走了，一齐走。”这样，我就又回到床上睡觉。

不久，我陪同毛主席一起回北京。当专列走到石家庄时，我将曾思玉同我谈话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我对毛主席说，曾思玉是老实人，他的态度是好的，有什么谈什么，只是水平与我差不多，我想曾思玉慢慢会通的。

毛主席听后“嗯”了一声。没有说什么。

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做黄、吴、叶、李、邱等人的工作，并将我于9月15日写给他的信和他的批示在政治局作了传达。

吴法宪看到我的书面检讨和毛主席的批示后，于9月29日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在这份检讨中，吴法宪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并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可是，他在检讨中把自己说成是“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

我把吴法宪的这份检讨书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后，在10月14日作了批示：“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主席还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写了许多批语。

吴法宪在检讨书中讲到他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在关系全局性的原则问题上，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毛主席在这段文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又在旁边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在吴的检讨书中讲他自己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段话的下边，毛主席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着：“这些话似乎不真实。”

在吴法宪谈到陈伯达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这句话的下边，毛主席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

吴法宪交代8月23日晚12点前后，陈伯达来找他和李作鹏、邱会作，谈到过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毛主席在这段话下边也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

当毛主席看到吴的检讨书写到“他（指陈伯达——作者注）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说话神态异常，说时支支吾吾”时，毛主席在旁边批示：“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

吴法宪的检讨书中揭发8月27日晚上12点以后，陈伯达来问他讲没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毛主席在“伟大谦虚”四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吴法宪提到陈伯达8月27日晚上核对上面那句话时，看到陈的发言稿上有“

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一句话，吴法宪认为这是“造谣”。毛主席在“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这九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

当毛主席看到吴的检讨书中写道“…他只参加过两次会，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怎么能这样做，并且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这句话时，在旁边批道：“这样对。”

10月12日，叶群也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承认“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毛主席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她的谆谆教导，使她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但叶的检讨书中把她的问题说成是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10月15日，毛主席看了叶群的检讨，并作了批示：“此件已阅。”并在装检讨书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后退中办存。”

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的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主席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时，毛主席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叶群在检讨书中引用毛主席讲过的话“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并在旁边批道：“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

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主席，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

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

叶群说自己“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论天才的语录，这就间接地上了陈伯达的当。毛主席在“不加分析地”五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

叶群还说什么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毛主席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

叶群在检讨书中还对陈伯达提出了一些疑问。毛主席在旁边写道：“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

叶群表示要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

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主席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毛主席这些批语清楚地表明，对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叶群、黄水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所犯的错误，都还是采取批评、教育、挽救的方针的。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后，为了继续解决这次会议上的问题，给林彪等人改正错误的机会，争取和挽救他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倡导开展学习和批判运动。

11月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各单位干部读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泽东著作，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1月16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指示提出了解陈伯达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要进行检举和揭发，将揭发材料妥送中央，并号召全党全军立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2月16日，毛主席对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了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12月18日，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说：“什么‘四个伟大’（指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作者注），讨厌！”

斯诺说：“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

毛主席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

“四个伟大”是林彪提出来的。毛主席的上述讲话显然是批评林彪。“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几次表示过对“四个伟大”提法的态度。我记得毛主席1967年2月3日会见卡博、巴卢库时，就说过：“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还有一次，可能是1968年元旦前夕，要发表一篇元旦社论。社论的草稿上提了“四个伟大”，毛主席不同意，他让我拿着社论的清样去钓鱼台找陈伯达和姚文元删掉。我问毛主席，“四个

伟大”您就不留一个？主席想了想说，那就留下一个吧！我又问留下哪一个。毛主席说，我是当教员的，就留下那个导师吧。其实导师就是教师，不过比教师高明一点。我到钓鱼台找了陈伯达、姚文元，让他们按毛主席的意见圈掉了。

1971年2月19日，毛主席对周总理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作了批示。提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黄永胜、李作鹏应同李德生、纪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1971年2月22日至翌年1月26日，召开了华北会议，对陈伯达进行揭发批判。

华北会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参加了，我也去了。

去参加会议前，我请示毛主席：“我要不要发言？”

毛主席说：“你现在是明白人了，为什么不发言？”

我说：“我先写一个东西给您看一看，不要又搞错了。”

毛主席说：“不用写了。根据我与你几次谈话的情况，我看你的思想已经通了。你讲吧，讲错了，回来我们再商量，再批判嘛！”说到这里，毛主席哈哈大笑起来。

1971年1月8日，毛主席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作了指示：“林、周、康三同志：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讲清了问题。请你们看一下，是否可以转发全军。如同意，请总理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讨论、通过，并加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总政治部的几句指示，即可发出。除军队外，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机关也要发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1971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召开一百四十三人参加的批陈整风座谈会。黄永胜等人既不真正批判陈伯达，又不作自我检查。毛主席对黄等人的态度不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月26日，中央发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在华北会议结束前（指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下旬召开的华北会议——作者注），毛主席采取了一个重要的措施，即1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在这个命令宣布之前，毛主席曾找李德生同志谈过话。

军委座谈会和华北会议前期，都没有开好。对此毛主席进行了批评。2月19日，毛主席在关于开始批陈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

2月20日，军委办事组根据毛主席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检讨报告。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又批示说：“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的，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还批示：“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毛主席对黄永胜等人不做自我检查，不认真批陈是抓住不放的。

与此同时，毛主席又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学好马列著作。3月15日，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批示：“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在十八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十七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等迟迟不肯承认错误。不肯作自我批评，直到1971年3月才交出书面检讨。尽管如此，毛主席对他们承认错误作出检讨的行动，仍采取了欢迎的态度。

毛主席看了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后，于3月24日在黄永胜3月21日的书面检讨上作了如下批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的问题。只在黄的第二页上有一个注语，请各同志注意。”

黄永胜书面检讨的第二页上有段话“过去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这个人有迷信，被他所谓‘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假象所迷惑。”毛主席对这段话批注：“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3月30日，毛主席又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作了批示，指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还在刘的检查的最后一页批示：“这还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

4月15日至29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参加会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29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汇报会上作了总结。

4月18日，我在这个汇报会的华北组小组会议上又作了第三次检查。我把当时检讨的内容抄录如下：

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在全会期间和全会以后，经过主席多次谈话，对我进行了严格的批评和亲切的教育，每次谈话对我的启发都很大，教育都很深。回京以后，又带着自己的问题，进一步学习了主席的光辉文献《我的一点意见》，学习了马、列和主席的几本著作。遵照主席“在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我同中央办公厅和警卫局、警卫团的同志们一起揭发批判了反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罪行。同时，也在会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由于主席的教育，政治局同志的帮助，使我进一步认清了陈伯达的反革命本质，进一步认识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下，会议开得很顺利，气氛很好。但是，会议刚开了一天，陈伯达在他的反革命野心的驱使下，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以伪装的面目出现，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红旗反红旗，采取突然袭击

，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实现他反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主席很快识破了陈伯达的反革命面目，适时地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这篇光辉文献，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

在这次全会上，把陈伯达这个大坏蛋揪了出来，教育了全党。团结了同志，避免了分裂，消除了隐患。这是伟大导师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针见血地击中了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陈伯达的要害，从理论上彻底揭穿了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揭穿了陈伯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反动本质，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对于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我坚决拥护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和主席一系列的重要批示，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一切决定，坚决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在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没有发表以前，我没有识破他是一个大坏蛋，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骗。当了他的炮手，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深感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对不起受误会的同志。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信任和教育，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内心极感沉痛。我的错误是：

（一）在华北组听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煽动性发言，我没有考虑分析，没有调查核实材料，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心情非常激动地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把不应该上纲上线的问题上了纲、上了线，使会议气氛紧张，不利团结，影响会议顺利地进行，当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炮手。

（二）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煽动说，有人不要毛泽东思想，有人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我没有识破他的阴谋，凭着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就火冒三丈，被他煽动起来了，错误地提议在新宪法中恢复设国家主席一章。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这是主席的意见，我是知道的。早在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主席要我从外地回京向政治局的同志转达了主席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家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可是当我听到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煽动性的发言，就把主席的指示忘得一干二净。在这关键时刻，我没有冷静思考。没有坚持原则，没有考虑到主席日日夜夜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操劳。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听毛主席的话，违反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十分错误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三）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第六号简报”来煽动、欺骗参加全会的同志，妄图分裂党，破坏“九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简报内容中陈伯达的很少。我的很多，事先又不给我看，这是一个阴谋，我上了当。被他利用了。

（四）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听录音报告的机会，把关于论“天才”的语录交给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这个语录打印后，放在我那里，没有使用，在陈伯达阴谋诡计被识破后这个语录已封存。现在看来，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

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

（1）对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恶意造谣，没有调查核实，没有分析判断。对在哲学上的欺骗和诡辩，自己不懂，也没有向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请教，主席教导：“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

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方法来”而我违反了主席的这个教导，结果情况不明，决心很大，方法不对。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上陷入极大的盲目性。主观主义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毛主席指示：“这和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过去对主观主义的危害性认识很不够，今后必须下决心“打倒主观主义”。

（2）过去没有“认真看书学习”，对马、列和毛主席的书读得很少，而且有些没有读懂。因此，思想和理论水平很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的团结不够，特别是遇到像陈伯达这样手段很阴险、很毒辣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他，反而受了他的蒙蔽，被他利用了。

（3）存在着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今后，我要很好地接受教训，带着问题认真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克服骄傲自满，争取较快地改正错误。真正做到在大风大浪中不迷失方向。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坚决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在毛泽东思想和“九大”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汪东兴 1971年4月18日

我的第二次检讨书送给毛主席看后，毛主席对我说：“你的几份检讨有阶段性，火候掌握得好，庐山会议后，大家到现在还跟不上气候，看来你跟上了。”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领导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同时，还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接连批发了许多文件和指示，毛主席把这个办这叫作“甩石头”；二是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当时被林彪、黄水胜、吴法宪等人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毛主席把这个办法叫作“掺沙子”；还有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在华北会议结束前改组北京军区，毛主席说这个办法是“挖墙脚”。

□ 摘自《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

【自由论坛】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五四”和文革

• 林贤治 •

五四传统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科学理性，自由民主，人道主义的源头，就外部而言，早为群众性政治运动所中断，为战争所中断，为国民党一党专政所中断。1949年以后，在和平建国的新阶段，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合理的承续；在某种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斗争从不间断，使它蒙受损害。反右斗争以言治罪，株连家属，覆盖面如此之大，是世所罕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对五四传统的全面背弃。背弃这一传统，其后果之严重，正如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形容的：“其结果等于砍了中国人的头，使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就是在这样谴责和反知识主义气氛中，‘大跃进’开始了。”接着他说：“革命的理想是解放人民，不是控制人民。然而这些理想主义者在革命成功后都受了罪。在成千成万这类事件中，我们看到革命开始吞蚀革命者了。”

大跃进是毛泽东独出心裁的尝试，然而这个尝试遭到惨败。虽然在庐山会议的

斗争中，他始终是胜利者，却无疑承受了更大的心理压力。在此后几年间，他曾发起过类似“四清”之类的运动，试图释放这种压力，结果没有成功。他必须找到一种彻底解决的办法。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在他那里，政治斗争目标已经变得非常明确，理论上也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一套；就在这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被提了出来。可是，在他的同志中间，这个危险的思想并没有引起普遍的警觉。这样，一个号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就像一枚重磅炸弹，于1966年通过一出历史剧突然引爆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新的起源，是一个因，但更多的是果。我们可以从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那里翻过来看这个问题。到了文化大革命阶段，不但毛泽东思想被推到了“顶峰”，流通在各个领域的被称为“左”的东西，各种潜在的矛盾和危机都发展到了顶峰，毛泽东就是站在多年所累积起来的结果——问题的顶峰——之上发动他的“革命”。他所以能够在“全面不抵抗”的情况下，顺利地推行他的计划而直奔目标，至少有两根固定的操纵杆与临时装置的方向盘连在一起：其一是反对资产阶级一修正主义的战略方针，要制造“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中国的赫鲁晓夫”实在太方便了，更不用说臭知识分子；其二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权威主义的确立，使个人领袖处于独尊的地位。当然，个人魅力也不失为一个因素，那种享受斗争的挑战性格和自由意志，对热情、轻信、好动，具有天然崇拜倾向的青年学生是特别富于吸引力的。加以运动一开始，就鼓励采取“大民主”的手段，这在长期因为民主空气稀薄而感到压抑的广大的人们那里，自然容易产生共鸣，难怪居高一呼，天下风从了。

有人以五四的文化性、社会性比附文革，其实大谬。文革只是五七年反右运动的放大。如果要分期，文革可简单地裁为两截：1966—1968年，此为红卫兵时期，特点是造反，混乱，无序；后期在1968—1976年，为新秩序时期，建立革委会，收拾造反者，进入斗批改，同样是一乱一治，乱极而治。只是文革比反右更具规模，更复杂，也更荒诞；因为局面宏大而控制不了，才有部队以“支左”名义的介入；不过唯其如此，正好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武斗的出现也许是预想不到的，然而无非是阶级斗争极端化的表现而已。其间，出现过许多“新生事物”，如样板戏，赤脚医生，“三结合”，学习班，交白卷，大批判写作组，工农兵学员等等，也都是建国后毛泽东系列试验的持续性或一次性展览，没有什么新意。毛泽东本人的“最新指示”，诸如“吐故纳新”，“走资派还在走”之类，也多是对运动现象的一种点评式总结，而非理论上的创造，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固有的东西。

毛泽东是五四运动的过来人。对五四也曾作过高度的评价；但是对于五四精神，在他的思想和实践中，都有着明显的矛盾和抵牾之处。尤其是文革，他容忍甚或鼓励个人崇拜，过于集中权力而独断专行，采取一种封闭而非开放的观点看待中国社会，满足于一种恩赐的自由和民主，这些都是脱离了五四精神的。五四全面反传统，而他对传统的观念多所偏爱和保留，轻视知识分子，有明显的反知识主义倾向，民粹主义倾向。作为启蒙运动，五四无疑重视思想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五四的启蒙，思想是来自西方的，现代的，新生的。毛泽东对意识形态不可谓不重视，在某种意义上说。文革就是“意识形态专政”；但是，这种专政，是在反传统的名义下对本土文化，农民传统的新的发扬。

除去背景的差异，在性质及其表现形态上，文革与五四南辕北辙，存在根本的不同。

一、五四是知识分子自组织，文革是他组织。“大宪章”《十六条》虽然声称“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姑不论后期对国家权力的强化，即使在前期，也是受“中央文革”的指挥和控制

的。所谓“炮打司令部”，打的只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不论怎样高喊着“踢开党委闹革命”，最高统帅和副统帅是不能炮轰的。五四时期是弱政府，所以有众声喧哗。文革期间，即使各级领导被打倒，“靠边站”，最高权力始终不曾悬置或空缺。两报一刊，舆论一律，表现出高度的指挥效能。因此，说文革是“直接民主”固然失实，指为“无政府状态”也不确。一声令下，民主就立即收起来了，怎么可能“无政府”呢？

二、五四重估一切价值，打倒一切偶像，真是摧枯拉朽。文革个人迷信盛行：红宝书，语录歌，忠字舞，红海洋；还有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弥漫着一种宗教气息。

三、作为运动的主体，五四主要是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起着启蒙作用，青年学生是后起的；在反封建文化的斗争中，他们目标一致，配合密切，是一支完整的队伍。在文革中，知识分子成了被批判和清理的对象。五四的一代，是学贯中西的一代；就说青年学生，也都具有相当的学养。文革时代的学生基本是“聋”和“哑”的一代，他们对西方文化除了敌视，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是一种畸形教育的牺牲品。由于他们的无知，轻信，往往造成过火的盲目行动，因此长期遭到在文革中受过损害的知识者的痛恨，斥为“流氓”“痞子”，把时代的暴行完全归结于他们，而始终得不到原宥。

四、五四是独立知识分子的自由联合体，带有鲜明的民间性和个体性。文革的造反派成分比较复杂，大约有部分在他们的造反行动中反映了社会底层的要求，从而给运动带来唯一的亮点；但是，相当部分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并不代表民间立场。

五、五四是天然的群众运动，具有先在的开放性和公开性。文革则是有预谋的，有目的有步骤展开的群众性运动，带有神秘的性质，许多重大事件也都蒙上了一层拜占庭式的气氛。

六、五四的参与者，都是真理的追随者，是真诚的理想主义信徒。文革的乌托邦色彩是浓厚的，但是带有欺蒙性。利用人们对民主变革的要求，例如在《十六条》写上巴黎公社原则，一开始就以它的权威主义，出身论，有关“正统”“嫡系”的派性争夺等等，显示了一种喜剧色彩。五四的冲突，是价值观念的冲突，理想的冲突。而文革，则更多地表现为实际利益的冲突，愈到后来愈是如此。

七、五四实质上是一场思想运动。文化运动，由此必然是多元多向的；所谓斗争也都处于同一层面上，是书面的争论和角逐。没有王者，没有公认的权威，也不需要大法官。文革号召“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目的在于剥夺独立的思想。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完全唯“最高指示”是从。它实质上是一场政治运动，其间充满了政治歧视，各种凌辱、压制和迫害。《十六条》满纸是“革命”的权利，唯独没有生命权。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德沃金指出：“如果政府不能认真对待权利、它也就不能认真对待法。”整个运动以暴力著称，毫无法律可言。单就公开的数字，在1966—1976年十年间，就有35万人被折磨致死。

八、文革的口号是：“破四旧、立四新”，其实只在形式和皮毛，并没有触及文化体制和观念中的封建主义，所以才有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上宪法之举。这种“政治继承权”，显然是王权主义的产物。而五四彻底反封建的。

九、与此相关，文革把几乎所有外国的东西都称之为“帝修反”、“资产阶级货色”而加以排拒；与列宁让无产阶级“掌握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一切文化”的思想大相径庭。五四则是“全盘西化”，反排外主义的。

十、五四旨在摧毁现存秩序，文革则是在体制内进行的，却恰恰捍卫了内部亟待改革的部分。五四不打革命的名目，却有革命的灵魂。文革从总体上不具革命性，没有新的主题，新的思想，新的成果。

十一、五四是伦理革命，是在反对封建道德的基础上，重建人性的道德。在文革，道德与良知成了革命的对象。人们变得狭隘、冷漠、嫉恨、残酷、虚伪，告密和仇杀之风盛行。这种社会文化心理的形成，公平地说，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的产物。但是在文革，道德的摧残尤为严重；为此需要付出的代价，就不仅仅是属于一代人的了。

早在三十年代，鲁迅就说：“五四精神有退无进”，甚至说了“五四失精神”的话。倘说这精神一脉尚存，那么及至此时，则已完全为文革所扼死。知识分子跌落到从来未曾有过的困厄的境地，人格也变为从来没有过的卑贱。剧作家曹禺回忆说：“‘四人帮’统治的那段岁月，真是叫人恐怖，觉得自己都错了，给我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倒是小事，自己后悔不该写戏，害了读者，害了观众。”“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历史学家范文澜受了中央文革组长康生、陈伯达批评后，立即写信给刘大年：“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接着又写一信给黎澍：“你毫不留情地加上自我批评的文字，愈过头愈好，请你站在敌对者的方面，尽量抨击，不大大抨击，将来自有人出来抨击，那就被动了”。那时候，不少人被逼自杀。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前，口袋装有遗书，其辞为：“我实在交不去（出）来 / 走了这条绝路 / 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 / 毛主席万岁 / 毛主席万岁 / 毛主席万万岁，”梁漱溟不甘寂寞，却写信给中央文革并转毛泽东，表示赞同文革：“主席此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社会之所必要。……当红卫兵来临，我以维护此一大运动的心情迎之……”诗人郭小川在五七干校时致信妻子说：“早已下定决心，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永远在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工农兵结合中改造世界观，永远生活战斗在第一线。”在宣布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时，又致信妻子说：“我的‘斗私批修’并不好，尚有一个问题需要补斗。……同志们都在祝贺我，但我认识到这只是革命的新起点，没有什么可满足的，只是斗争和改造的任务更加加重而已。”五七干校本来是一个带有集体惩罚性质的劳动场所，臧克家陶然写了大量赞美诗。他在诗集《忆向阳》的序言中写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于1969年11月30日到了湖北咸宁干校。这个日子，我永生不能忘。它是我生命史上的一座分界碑。”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随即写诗助阵；一年过后形势大变，复歌颂“英明领袖”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论风向如何，唱颂歌是诗人的本分。一些荣幸进入御用写作班子的如“梁效”“石一歌”辈，把灵魂卖给权势者，至今讳莫如深。其中，如周一良著书回忆，题为“毕竟是书生”，分明为自己开脱：余秋雨大论“嫉妒”而骂“小人”，则要努力保持“文明的、高贵的社会形象”，使“社会增加一点高贵因素”。

“士林”如此，怎么可能指望从中产生独立的思想者呢？倒是极个别的“士林”之外的人物，如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以他们诚实的声音打破了禁锢的沉默。在一个只懂得说谎的国度里，诚实就是思想。他们的文章，日记，言词，诚然说不上“深刻”，但是价值连城，是那些专一阐释别人的“思想”而自以为高贵的学者的论著所无法比拟的。然而，他们竟死于屠刀之下！在历史的记忆中，有那么一根喉管，一直到今天仍然在滴血！

□ 本文节选自长文“五四之死”，原载《北京文学》一九九九年第五期，该期杂志被当局强令撤掉此文后，方得改版重印出版。

∞ ∞ ∞ ∞ ∞ ∞ ∞ ∞ ∞ ∞  
从造反派与五七年右派的共通点审视文革  
——兼论谁该忏悔？忏悔什么？（连载之三）  
• 常 仁 •

三、片面强调“法制轨道”，使司法腐败成为制约中国法治建设的巨大障碍。

是实行“人治”，还是实行“法治”？似乎是划分民主和专制的一条重要分界线。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以法治国看作是实行民主的保障条件，而看不到法制的有效运作，同样依靠民主来加以保证。在这方面，某些自由主义学者也认识到：没有自由的舆论监督，“法制”绝对不会自动转变为“法治”。〔42〕

中国政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在加强法制建设、健全法律法规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由于否定了以“自由的舆论监督”为重要内容的“四大民主”，使各级行政和执法人员普遍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从而导致了以“徇私枉法”、“有法不依”为特征的严重司法腐败。而根据有关人士的研究分析，目前社会上的贪污犯罪之所以愈演愈烈，司法腐败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据1999年10月15日北京《晨报》报导，1999年1至8月办案三大特征之一是重点案件增加，共查办党政机关、司法执法机关、国有企业、金融、粮食等系统的案件229件，上升32%。“北京是首都，是政治法律的中心，尚且如此，其它各地恐怕只有过之而无不及。贪污腐败、犯罪率不断上升，是全国人民最痛心最痛恨的大问题，也是国家的心腹大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司法腐败则是其重要因素。……《经济日报》1999年10月5日刊登陈汉华的文章指出，据统计某市1997年判处经济犯罪分子104人，其中缓刑65人；有个基层法院判处21人，缓刑19人；1998年判处97人，其中缓刑63人；有个基层法院判处六人，全部为缓刑。判处缓刑的经济犯罪案件95%是万元以上的大案。人们不禁要问：这样轻判，如何能遏制严重的犯罪？这里面是否有“钱权交易”的腐败现象，不得而知。”〔43〕

上述情况表明：由于司法腐败成为秉公执法的巨大障碍，单纯通过法制轨道来解决腐败问题的有效性就大为降低。还有人认为，加上“法不责众”的因素，更增添了法治的难度：“近年中国大陆官场的腐败日益严重，民怨加深，北京当局制裁了一批贪官，但有问题的官员数不胜数，若都诉诸法律，无疑将打击一大片，于是江泽民创造了“三讲”这种方式，发动群众对各级官员进行监督。”〔44〕

由此可见，中共之所以把“三讲”运动作为反腐肃贪的一个重要方面，也许可以看作是最高层终于认识到：再好的法律法规，也必须靠人（党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觉悟）来贯彻实施。这比片面强调法制显然是一个思想进步。但是光凭提高人自身的觉悟，而忽视外部的民主监督和制约，就很容易向陈旧的“吏治”（即“人治”）轨道复归。因此，能否在“三讲”中真正做到大力发动群众，对各级官员进行严格的民主评议，并使之成为一种能够长期坚持下去的民主监督制度，对于中共跳出片面强调法治的偏差，按历史扬弃方式借鉴和发扬文革中群众性民主监督的正面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有位网络作者指出：

——是依靠“吏治”还是“治吏”，这是自明、清以来中国封建历史政治的核心，



与当时社会政治体系的兴衰存亡直接相关。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献，进京后多次以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告诫全党。而后又针对党内官僚主义形成官僚帮派的迹象，提出“党内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概念，这既是对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修正主义现象的经验总结，也是出于对大历史结构框架下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前景的政治思考，更应该说是中国文化历史的政治思考。

换句话说，文化大革命是鉴于中共必须超越历史怪圈的使命，通过创造一个全新的人民民主政治运作机制，坚决地选择了以“治吏”取代“吏治”的民主道路。毛泽东告诫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别无它法，只有依靠人民民主。一条贯穿中国古今历史的定律就是：官僚政治专权，必是官吏贪腐作恶的条件。这更与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文化水乳交融，儒家文化在显文化层面溶入政治后的御用本质，是文人政治走向政治腐败、以乱天下而终的必然结局。

“吏治”者，明亡于此，清亡于此，皇权奈何？！蒋介石以专权治之，又奈何？！如今执政党多次重申“反腐倡廉”，并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又奈何？！指望着“清官”、“明君”出世，是根本行不通的愚腐。充其量不过是改革、渐进的一种良好愿望罢了。无论是封建皇权，还是政党政治，历史与现实说明这个官吏政治层，搞不好就是中国政治的祸根。汉奸、卖国、贪污、腐化，……无一不出自于这个肆无忌惮的政治权力层，并在改革的话语下迅速地向社会蔓延……。无有它法，只有民主！民主治吏。（45）

上述观点虽然对文革在民主实践方面的正面意义估计偏高，但是却一语中的地点出了“吏治”和“治吏”的本质区别。中国政治和知识精英之所以迷信“吏治”而反感“治吏”，强调法律秩序而贬低民主监督，或者是受了西方右翼自由主义“民主参与形式会带来多数人暴政倾向”的思想影响，（46）或者是受中国封建主义残余和保守主义思潮影响，迷信专制威权统治而视民众为群氓阿斗。而这两类思潮之所以在中国广有市场，对文革“大民主”负面作用和造反派负面行为的渲染夸大，扮演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此，把大多数造反派在文革“大民主”中的真实情况，实事求是地讲清楚，殊为必要。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告诉那些光注重发展而不注意社会公正的人们，当他们的所作所为使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总有一天会受到社会的激烈反弹和报应。而急风暴雨般席卷全国的文革造反，从最初“推翻三座大山”的农民起义演进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这种报应的极端表现形式。严格地讲，对这种报应本身，其实是无所谓肯定和否定的。一个人如作恶多端受到了报应，你很难说这报应本身是好是坏。恶有恶报，恶报就是恶报，完全没有必要强调恶报中还存在着善。但如果恶人们出于既要作恶又不想受到惩戒之目的而拼命诋毁文革，那就必须有人出面说明这种“恶”的历史合理性和正当性——哪怕我们明明知道，以毛那种文革形式，必然会导致非理性行为和失控局面，而根本就无法取得所期待的正面结果。

#### 四、削弱劳动人民政治经济地位，把贫富两极分化作为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必要代价。

要深刻反思文革，必须研究诞生于西方的共产主义思潮，为何能够在中国找到肥沃的土壤？或许，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本身所具有的强烈平均主义色彩，与中华民族“不患寡、患不均”的千年思想积淀，具有某种不解之缘。这种“均富”思想不仅在民间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而且在上层社会的统治术里也不无反映。由于贫富悬殊和为富不仁常常引发社会变乱，因此统治比较清明的朝代，通常都比较注意不让富者太富，并把打击豪强作为兴邦定国要务之一。中国传统思想的这一核心特征，也为近代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所承袭；他的民生主义，可以看作是这一民族思想传统的集中体现。

这种历史传统，显然在中共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本土化”的过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在毛泽东缩小“三大差别”指导思想的鼓励下，体现这一传统的平均主义思潮，在文革期间一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揭露批判“走资派”的特权思想及其“修正主义腐朽生活方式”，成为造反派革命行动的重点之一。这类批判斗争在很多情况下所显示的荒谬性和残酷性，在文革被否定之后，很自然地成为造反派胡作非为的主要历史罪名之一。似乎按照“物极必反”的原则，曾经被文革造反派批判的糜烂生活享受方式和对经济政治特权的追求，逐渐变成了社会时尚和为主流“改革语言”所肯定的合理行为。为了给日趋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和“大款”们的穷奢极侈辩护，人们不惜引进西方自由主义的学说理论作根据。少数“富有者尝试贫困者无力企及的新生活方式”，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不法二门。（47）

广大普通民众渴望平等和均富的思想，成了推进现代化所必须扫除的“精神病灶”。（48）面对生产过剩和贫富悬殊所造成“通货紧缩”经济困难，反对调整分配，声称关键“是如何把饼做大的问题而非如何切饼”的说法，（49）似乎成了一种主流声音。在把扩大贫富差别作为推动改革和促进社会进步必要代价的人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化公为私而非勤劳致富所造成的20%银行私人存款者占据80%六万亿存款的情况，是可以忍受的；（50）富人一席酒吃掉穷人几年粮的情况，是可以忍受的；达官贵人豢养的小狗小猫以牛肉炼乳为食而不少下岗失业者和农民温饱不能解决，是可以忍受的；成千上万名农民子弟因经济困难而失学而许多暴富者花费巨资送子女出国上小学中学，是可以忍受的；邓小平所说的“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改革出了问题，也是可以忍受的。他们到处鼓吹“应该把饼做大而不应想着公平分饼”。如果有人提出要对因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所造成的严重贫富悬殊，进行重新调整时，他们就一口咬定这是不现实和不可行的。

人们横竖想不通：通过群众性的反腐肃贪收复国有资产，使国家能够掌握足够财源以调整缓解贫富悬殊问题，为何不现实和不可行？其实，只要借实行储蓄实名制之机，把六万亿私人存款中可疑部分加以冻结和依法清理，哪怕只要收复巨额流失国有资产中的一半，就足以解决目前贫富悬殊过大的问题。所谓的“不现实和不可行”，到底有什么像样的根据和摆得上桌面的理由呢？本人迄今为止所听到的唯一声音，就是“这会造成另一场文革灾难”。

这种与文革挂钩的不是理由的理由，从表面看似跟造反派文革时过激行为造成的社会反感有关。但如果仔细推敲一下，却会发现这跟自由主义人士对所谓“民粹主义”的不断批判声讨关系更大。人们在拥抱以扩大收入差距来促进经济发展的西方“社会自然演进”理论时，似乎既不顾中国人均占有资源名列全球160位之后的严峻国情条件，（51）也忘却了中国几千年治而复乱、乱而复治恶性历史循环所提示的深刻教训。他们似乎认识不到：在文革中亿万民众所显示的“民粹主义”和平均主义狂热背后，实际上站立着的是中华民族深厚弥坚的“均贫富”传统意识。这种意识既不是因为某个天才革命家的高超灌输，更不是那个理论狂想家蓄意培育就能培育出来的；而更应该说，它反映了中华民族长期面对自身苛刻的环境资源条件，在求取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演进过程中，逐步发展积累下来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和保护功能。如果认识不到文革时造反派群众猛烈冲击特权思想和行为所包含的某种合理性和必然性，因两极分化过度引起社会激烈反弹并导致中国改革夭折甚至制度崩溃的威胁，可能会经常存在。而这种必然性，即使是在人均占有资源比较高的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波、匈、捷等国的政治动荡，到苏联以官僚特权统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被人民最终唾弃，都一再作出了执拗的历史提示，毛泽东发动文革，不过是对共产党掌权后通常会面临的这种“蜕化变质”趋势，采取“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方式，通过主动“引爆”来加以遏制和化解。而对这种趋势比较敏感和反感的造反派，似乎就成了自己被炸得粉身碎骨的政治“爆破手”。

自由主义者经常嘲笑社会主义理念的持有者，对历史发展抱有一种浪漫主义性质的“乌托邦怀念症”。自由派人士之所以自认为所信奉和宣传的社会理论最为现实，最少空想成分，也许是因为他们认定：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道路及其全球化扩展进程，乃是代表了人类社会“自然演进”的一种必然。与此相对立的、试图扭曲这一自然演进过程的“理性建构”思路，则已经彻底破产。而汪晖对此的驳斥是：这种所谓的“自然演进”，其实也不过是一种人为的构筑。汪丁丁则反诘道：当汪晖所认为的“市场”也是“有意识的创制”时，人们搞不清楚这是说“市场”的创制者们通过一系列交易行为和社会博弈所形成的制度呢？还是说“市场”是被某些群体强加给其他人的？而只要还能够区分“自愿”与“强迫”这两个很不同的状况，人们就应该把“市场”作为社会博弈的过程来看待。而这一意义上的市场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古今已有之的制度。（52）

汪丁丁为市场“自然演进”性质所作的这种辩护，显然回避了在这一演进过程中，那些取得优势地位的势力，总是会为了维护既成利益格局和经济支配关系，持续不断地设定和更新种种规范的历史实质。鲁迅先生所憎恶的“铁屋子”，当然不可能是在一朝一日突然建造起来的。这也许就是汪晖所说的“有意识的创制”的本意吧。纵观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貌，自由主义者所批评的“害苦了社会”的“浪漫主义理性建制”对市场“自然演进”的干扰甚至颠覆，又为何不能看作是人类整个“自然演进”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此，我不妨举一个有关中国打工妹命运的事例。据陕西省咸阳市妇联成秀琴做过一项统计，一九九八年一月至九月，大陆各大报刊报导有关打工妹因反抗凌辱而跳楼的事件就有十三起，总计二十三人之多，其中有四人死亡，十三人因此伤残。人们看了这一报导后不仅要问：那些没有被公开报导的跳楼事件又有多少呢？（53）

请再看另一则报导：“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上星村一间台资电子厂，十二日下午发生严重火灾，有十六人丧生，八人伤。……据现场消息透露，当时正在三、四楼上班的员工有一百六十多人，而厂方在火灾发生后只顾抢救物资，并无安排员工逃生。有目击者表示，由于厂房设有防盗网，大量员工被困在三、四楼无法逃生。他们唯有尝试破坏防盗网，再从窗门跳下逃生。大火初起时，工厂负责人只顾叫工人抢运物质，没有及时组织工人逃生，加上火势过急，浓烟太大，十二名女工和四名男工无法及时逃生，吸入过量浓烟窒息致死，另有八人重伤。”（54）

人们不禁要问：面对人身自由和安全都无法得到基本保障的情况，这些打工者为何不得不忍受这类悲惨境遇？当右翼自由派经济学家一味吹嘘“市场无形之手”的神奇之处时，我们是否也看到了这只“手”在剥夺劳动者政治经济地位方面不可抗拒的魔力和残忍血腥？由于国内传媒的冷漠和受控状况，上述境外报导反映的情况，很可能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真正会害苦这个社会的，恰恰是那些借着市场机制作威作福的“为富不仁者”。而他们在有意无意中所播种的怨恨和激化社会矛盾的种种恶行，必不可免地会造就反抗其恶行的“造反”队伍；就像人体进入了病菌，总有一部分白血球细胞会自动组织起来奋起抵御一般。任你怎么劝阻人们不要太浪漫不要太乌托邦，物极必反的自然定律，迟早会发生作用。如果抱有强烈终极关怀精神的左翼自由派人士，都对那些导致苦难的社会和经济根源，以及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惨剧悲剧，抱着“历史进步难免代价”的看法，如果声称以谋求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基本出发点的中共当局，连对采取西方社会民主党所热衷的征收遗产税、利息税、严格个人收入累进税征收、实行实名存款和申报大额存款来源这类基本的贫富调节做法，都犹豫不决，那么我们经磨历劫多灾多难的祖国，也许就真的再次在劫难逃了！

自由派人士在谈论中国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时，引述了一位民营企业家的这样一

段妙论：“……国有资产‘流失’到民营企业家手中，而民营企业家本人与其家庭可能消费的部分，充其量只有其中的千分之一。而他们会精打细算，以市场规律合理地配置其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资源，把它们用来创造就业，发展生产，这才是对社会负责。”〔55〕

我想，这大概就是自由派人士经常不遗余力宣传的所谓“对现代化进步的合理性”。而在我看来，这种挂在“创造就业”名义下的“合理性”，其要害却是有意掩盖这种资产转移不仅使少数人非法侵吞剥夺了多数人的资产和利益，而且创制了一种赤裸裸的阶级压迫、经济剥削和人身支配关系。更为不能容忍的是，在上述报导中，我们所闻到的又是一股多么强烈的血腥气味！而说到底，这种血腥气并不如国内某些理论家所认为的是中国式“市场运作”的特产，而恰恰是弱肉强食型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的本质反映。而西方发达国家市场运作之所以看起来比较“仁慈”、“人道”，内部是由于西方社会近百年社会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和工人运动的逼迫推动，外部则一方面得益于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另一方面是一度迫于国际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劲挑战和竞争。如今随着冷战结束和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失势，西方资本主义朝其原始本质的“返祖”运动已经日趋明显，我们又怎么能指望，受资本主义贪婪本性和市场经济“丛林规则”支配的中国少数新富者，会慈悲大发地赏赐给全国人民一个同样“仁慈、人道”的资本主义乌托邦呢？

很显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界和经济界人士所担忧的社会稳定破坏性基因，并不起源于所谓“文革余毒”的卷土重来。真正会把中国拖进动荡内乱危局的，将是新贵阶层在某些似是而非理论支持维护下的种种倒行逆施、胡作非为，以及政府的无所作为、袖手旁观。当“剥夺剥夺者”呼声终于响彻神州大地之时，我想这既不是某种过时教条在中国土地上的“回光反照”，更不是浪漫主义和乌托邦空想的卷土重来；不是的，这不过是人类普遍公理的苏醒和自然复归。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至少按照大体上被执行的表面规则，所有用掠夺手段攫取非份所得的行径一经被发现，都会受到惩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法庭，会依据偷盗欺诈者的花钱方式，作为判断他们有罪无罪的依据。因为可以肯定，如果这样做的话，这个社会赖以生存和正常运转的经济、伦理道德和法律基础，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这也许就是中国左右翼思想者之间所存在的原则性立场区别之一。

朱学勤先生在《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一文中，对中国“不患寡、患不均”的千年民族思想积淀及其社会含义，是看得那么真切，因此而应该“对着干”还是“顺着干”，如果我们暂且放开西方舶来的所谓“自然演进”理论，冷静想一想中国千年恶性历史循环所包含的深刻教训，到底是哪一种现代化思路更“浪漫化”？哪一种更具实际操作意义？恐怕不难得出解答。如果我们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视野去考察历史，无论是十九世纪末激进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以及从二十世纪初中国民众的革命反抗直至发展到文革时期造反派对社会不公和官僚特权的狂热攻击，还是近年来中国新左派思潮的崛起，恐怕都应该看作是人类发展进程中必然产生的纠偏匡正机制。而且我相信，在有人要毁坏这一机制的时候，一定会有另一部分人以无比的热忱和富有创意的更新能力，把它复制出来！当有些学者担心中国可能会重复二十世纪的苦难历史时，实质上也许是无意中已经听到了这一机制，正在进入自发启动时所发出的隆隆轰鸣之声。

#### 注释

〔42〕汪丁丁“法制乎？法治乎？”《财经杂志》

〔43〕李凌“司法腐败是贪污犯罪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因素”粤海金融控股研究部，No. 2000-9，2000年2月18日

〔44〕“江泽民南巡掀三讲旋风”《亚洲周刊》第9期，2000年3月5日

〔45〕醉禅“‘吏治’、还是‘治吏’”《新观察》（www.xgc2000.com）

〔46〕“民主作为所有人都参与公共事务的政府参与形式带有多数人暴政的危险。同样，民主中隐含着平等主义的倾向，这又带来了泯灭个性的危险，最终带来专制主义。……在当代，对民主的威胁，不再是来自公开的敌视，而是来自对民主的过分热衷和颂扬。这种热衷与颂扬，不是给民主以恰当的位置，而是把民主抬高到与自由并驾齐驱的程度，乃至以民主的名义变相地妨碍、抵消自由。……若放弃自由去追求民主只能导致大革命式的奴役和暴政。”（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

〔47〕《为“大款”的奢侈辩护》“我们所期望的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讲，似乎都是上述那种不平等现象的结果，而且如果没有这种不平等，似乎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正是这些奢侈品或浪费者，是人们尝试一种最终会为大众所享用的生活方式的代价。我们可以说，那些将得到尝试并在日后得以发展的物品之范围的扩大、以及那些能使大众受益的经验之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对现存财富的不平等分配的结果。……在进步的任一阶段，富有者都是通过尝试贫困者尚无力企及的新的生活方式而为一个社会的进步做出其不可或缺的贡献的，如果没有他们做出的这种贡献，贫困者的进展便会大为延缓。”（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第三章 进步的常识 强国论坛 1999-11-24）

〔48〕朱学勤《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

〔49〕“……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种杀富济贫的平均主义思想有可能使中国社会全面倒退，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把饼做大的问题而非如何切饼的问题，一张小饼，不管怎么切也是很难让人满意的。”（厉以宁教授在“科教兴国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先进中国人的网上家园” <http://www.263.net>）

〔50〕《为富有者一辩》“收入分配差距通常又被一些人称为分配不公。一个“不公”，便会令高收入者陷入很难堪的境地，让他们觉得该去闭门思“过”了。而那条被传媒反复引用的数字，即5万多亿居民储蓄存款中有80%的钱为20%的人所拥有，而80%的人只拥有剩下的20%左右的存款，也足以让人愤愤不平。……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应该可以明了对于不同的富有者采取何种态度，从而慎言“不公。”（《证券时报》1999-08-01）

〔51〕李少君“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讨论生态环境？”《天涯》2000第一期第16页

〔52〕汪丁丁《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

〔53〕《多维新闻》1999/06/10报导

〔54〕《星岛日报》1999/06/14“深圳台资厂活活烧死16工人”

〔55〕萧功秦“世纪之交中国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前景展望”

（未完待续）

□ 寄自加拿大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新民（美国） | <cnd-cm@cnd.org>   |
| 本期校对：       | 晓峰（加拿大） | <cnd-cm@cnd.org>   |
| 读者技术咨询：     | 月边（芬兰）  | <cnd-help@cnd.org> |
| 网络技术维护：     | 张雨田（美国） | <cnd-info@cnd.org> |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吕青（加拿大） | <cnd-cm@cnd.org>   |
| 《华夏文摘》主编：   | 李彤彬（美国） | <cnd-cm@cnd.org>   |
| 《CND》总编：    | 熊波（美国）  | <cnd-cm@cnd.org>   |

---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HZ或GB-UU编码版）以及CND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 T P服务站地址: ftp.cnd.org[206.135.33.5]: pub/hxwz  
canada.cnd.org[142.132.1.13]: pub/cnd/

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